

经济学者看湖北

##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着力点在哪里

访谈嘉宾

黄汉权  
党委书记、院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阅读提要

■ 内陆开放既是内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内陆开放有着巨大的机遇，有助于拓展内陆地区发展空间，有助于提升内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湖北需要充分发挥全国经济地理中心、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大通道中心枢纽地位，加快建设新时代“九州通衢”，通过建通道、搭平台、释活力、优环境，将区位和既有平台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胜势。

打开内陆开放的“空中出海口”  
提升湖北乃至中部地区对外开放能级

记者：花湖国际机场现在是湖北的一张名片。从全球全国看，花湖国际机场的建成投运对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有何影响？如何借助这一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黄汉权：近年来，湖北在已有交通优势基础上，建成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运吞吐量和国际航线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正在打开内陆开放的“空中出海口”，将为湖北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作出重要贡献。

从国内影响看，花湖国际机场紧邻长

江黄金水道，地处华中之“中”，在1000公里半径的1.5小时飞行圈内，覆盖全国90%的经济总量、80%人口和全国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其全国中心枢纽地位，将为湖北融入国内大市场、促进国内开放合作、打造全国重要枢纽经济中心提供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从国际影响看，花湖国际机场已开通多条国际货运航线，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构建了辐射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国际航线网络。这种国际化物流枢纽功能，将推动湖北和中部地区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提升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利用这一优势，湖北要深化对外经贸

合作，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动“湖北造”全面走出去。湖北拥有众多知名的桥梁、铁路、建筑、水利等大型工程建筑企业，在国内基建投资空间狭窄的背景下，可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湖北工程装备输出向高质量装备和技术、标准、品牌全面输出转变，提升中国工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围绕科技研发、加工制造、农业产业、资源利用等领域，培育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鄂企抱团出海、集聚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加征关税影响，提

升相关领域国际竞争力，打造内陆腹地链接全球的重要支撑平台。

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培育优势产业，加快通道建设，实现经贸“优进优出”，继续实施“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拓展投资合作领域，推动湖北经济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和更高水平上开放发展。依托枢纽优势，强化本地跨国企业组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吸引国内外企业建立研发、生产、组装、物流、销售基地和结算中心，协同海外市场构建安全可控的跨国供应链，助推湖北和中部地区更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湖北乃至中部地区对外开放能级。

摆脱传统角色束缚  
内陆开放的三大机遇和机遇的三大特点

记者：历史地看，我国对外开放是从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江、沿内、内陆地区由东及西渐次展开的。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内陆开放视为新的机遇？这种机遇的特点是什么？

黄汉权：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内陆开放作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内陆地区来说，内陆开放有着巨大的机遇。

一是有助于拓展内陆地区发展空间。长期以来，受交通不便利、基础设施不完善、

产业发育不足等因素影响，部分内陆地区过去只是充当沿海发达地区的初级产品或原料供应基地的角色，还有部分地区尽管成为独立发展单元，产业链相对完整，但自身市场空间有限，进入东部地区市场缺乏竞争力。通过开放内陆地区，可以打破地理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投资和配置资源，打开内陆市场发展空间。

二是有助于提升内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陆省份通过依托中欧班列、陆海联运、空中丝路等，加快开放通道建设，推动高水平开放，不仅有利于引进科技、投资和人才，还能推动更多传统优势产品和品牌走出去，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是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革

开放之初，沿海相较内陆最大的优势就是处于开放前沿，而内陆地区通过加快开放通道建设，逐渐拥有了比较好的开放条件，进而吸引产业和资源集聚，这必将带来内陆地区经济快速跃升，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将逐步缩小。

内陆开放背后的机遇主要有三大特点。

其一，系列政策含金量高。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以及优化生产力布局等相关政策落地，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正在进一步向内陆地区倾斜。

其二，耦合内陆发展阶段和需求。近

建通道、搭平台、释活力、优环境  
把区位和平台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胜势

“通衢”，通过建通道、搭平台、释活力、优环境，把区位和既有平台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胜势，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支撑。

“建通道”就是要构建高效率开放大通道。推动花湖国际机场与天河机场携手构建城市群、都市圈中独一无二的航空客货运双枢纽，打造服务全球国际贸易的航空货运大通道。不断提高黄金水道能级，让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完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参与构建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依托南

北大动脉，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搭平台”就是要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提升湖北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战略能级，强化中德、中法、中日等国际产业园区开放功能，积极争取增设综保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提升口岸通道发展能级，提高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及与本地产业需求匹配度，提升重点港口“通江达海”“江海联运”能力。

“释活力”就是要释放产业外向发展活力。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开

放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巩固提升传统外贸业态，注重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优环境”就是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创新探索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全链条公平竞争审查系统，持续优化“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优化外商投资管理、服务机制，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积极开展跨境贸易安全与便利化合作。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突破“卡脖子”问题，增强供应链弹性

记者：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湖北如何吸引外资、跨国企业参与到国内经济循环活动中来，不断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

黄汉权：对湖北来讲，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产业是有望突破万亿的主导产业，要围绕重点产业吸引外资、促进国际合作，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一般而言，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目标包括产业链生态完善、产业创新引领力强、产业链安全韧性足、产业链循环畅通、产业可持续发展等。

从完善产业链生态看，一方面要发挥主导产业跨国企业作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共建产业链；另一方面，通过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从提升产业创新引领力看，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创新前沿领域还存在短板，不少关键环节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需要依托湖北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和与中德、中法、中日等国际产业园区，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维度开放合作，在前沿

领域技术孵化、多元化投入、早期市场培育和产业生态营造等方面共同部署创新链，推动形成良好创新生态，打造相关产业全球新高地。

从提高产业链安全韧性看，湖北部分主导产业的一些环节还存在供应链风险隐患，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国外依赖度较高，需要“练好内功”，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同时，多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东盟、中东、墨西哥等“第三地”曲线进口，增强供应链弹性。

从畅通产业链循环看，产业国际国内

产循环是产业链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要围绕重点产业，依托湖北自贸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培育一批主导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链主企业，创新“出海”模式，推动从输出产品向布局产业链转型，更加主动、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协作。

从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看，要围绕主导产业，加强绿色技术合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外方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加强绿色标准与合格评定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修订，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达峰碳中和等规则方面衔接互认。

起跨省协同的产业生态圈，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打造长江黄金水道供应链组织中心。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充分发挥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优势，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花湖国际机场、国家级园区等开放平台，强化交通市场枢纽功能，搭建多个供应链平台，围绕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培育一批供应链链主企业，整合和组织国内外、上下游资源，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集群竞争力，增强产业韧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双双 整理）

以“用”为导向踢好“临门一脚”  
加快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记者：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次设置主办国和主宾省，湖北是本届链博会唯一的主宾省。从一些参展的代表性企业来看，很注重供应链的安全性。2024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也显示，2023年以来，主要的经济体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韧性问题。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湖北如何抓住机遇，更好地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黄汉权：当前，全球供应链作为连接生产、分配、消费的关键环节，正经历前所未

有的重构与变革。这不仅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优化，也将对全球供应链形成巨大冲击。

湖北首先应抓住新一轮科技变革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机遇。以“用”为导向，聚焦光电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重大技术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踢好关键技术产业化“临门一脚”，突破性发展五大优势产业，做强做优“51020”现代产业集群，加快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畅通湖北参与国际国内循环的堵点卡

点。对内应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的协同联动发展，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沿江高铁、三峡水运新通道、荆汉运河等重大项目。对外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

引领中部地区协同发展。湖北可以通过做强武汉、襄阳、宜昌荆三大都市圈，加强与中部兄弟省份协作联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推动中部地区各省相互借力、优势互补，逐步构建

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数字化正成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策略发生系统性变革和功能性升级的关键性力量。认识数字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时与势，着力构建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机制，对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不少地方抢抓机遇、积极谋划，推动数字化生态治理更具效率和科学性，与此同时，少数地方对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认识理解还不深，行动缺乏实效。把这项工作抓到实处，要避免陷入误区。

## 误区一：盲目跟风

这主要体现在有关方面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还不清晰，缺乏系统考量与规划。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的是看到别人在运用数字化手段，脑袋一热跟上去，对自身基础、条件等缺少研判与分析；有的是看到互联网浪潮涌动，为了不显得自身工作方式陈旧、工作理念落后，搞“面子工程”；有的是强行嫁接，生硬转型，空有数字化外壳，生态治理没有打开新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同时也指出，“要脚踏实地、因材施教，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首先要看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深刻演变，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方式。面对这个大趋势，生态治理这项系统工程中的各类主体，需要耳聪目明，不能不看方向、不观风向，毫不在意、不为所动。

同时也要保持清醒，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都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们的生命力是在实践中涵育的。既不能违背规律，也不能盲目乱动，让数字“赋能”变“负能”。

## 误区二：手段、目的模糊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持续组织打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行为，查处了多起涉嫌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案件。比如2023年8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的自动监控领域6个典型案例就显示，某地一家企业总排口COD自动监控数据与平时的数据反差极大，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原因不在设施问题，而是操作人员“人为操作”所致。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提出，到2025年，“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以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数字化是手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是目的。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其重点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和实效，致力于解决各级政府各部门在生态治理方面存在的信息孤岛、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等问题，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生态治理在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和跨区域等方面的优化协同和系统集成。

把手段当成目的，就会本末倒置，沦为形式主义。假数据、假信息频现，会极大影响决策分析与举措制定，不仅不利于生态治理水平提升，反而有害于生态文明建设。

## 误区三：重数据采集，轻实际应用

近年来，各地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高度重视环境信息化建设，加强环境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互联网+环保”“智慧环保”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有少数地方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不高，信息资源应用滞后。

环境信息数据的采集是海量的，如果各系统之间交互性不强，就会因数据相对分散而产生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现象。大量环境数据信息均以数字形式存储在系统内，如果只是停留在查询检索和统计功能上，不能为生态治理提供有效的具有深度分析和辅助决策的信息，就难以实现信息资源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综合利用。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在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方面，大数据技术可以结合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进行土地分类和资源评估，指导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规划。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提前采取措施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害，可以监测和评估生态保护区的运行效率，及时调整和优化保护措施。只有以“用”为导向，数据信息才能活起来，才能深入嵌入生态治理过程，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 误区四：将转型视为被动的“要我做”

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领域，对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有清醒认识，“我要做”的主动性强，哪怕受过阵痛，工作局面和发展气象就比较好。与之相比较，仍有一些方面将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视为上级“要我做”，包袱心理重，被动性明显。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从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共享机制，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完善数据管理和安全保护措施，到建立数据标准对接和分类体系，使不同来源的数据能够互联互通、无缝对接，提高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效率；从引入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的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让潜在问题能够被有效识别并及时应对，到让大数据技术为公众参与生态治理提供更多渠道和手段，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和主动参与意愿，抓好这些工作，都需要摆脱应付心理、凑数心态，真正把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抓实，为一个地方、一个领域的工作打开新天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锻造更多可用、好用、管用的“利器”。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需避免几个误区

吕胜男 邓宇昂